

人文与社会译丛

后形而上学 思想

[德国] 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付德根 译



译林出版社

主 编 的 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迢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刘东 1999年6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本书收集了我两年来所撰写的哲学论文，编排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当然，从这种随意的编排当中，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前三篇论文是对近来要求回归形而上学思想的思潮所作出的反应。文章坚持一种带有怀疑色彩，但并不悲观失望的理性概念。第二编中的论文所讨论的是语言分析中的实用主义转型。它们的写作风格和前面的有所不同；它们在当代意义理论和行为理论语境中对交往理性概念进行阐明；其中有重叠的地方，虽说显得多余，但我没有把它们删除。第七篇论文从一个比较外围的角度讨论了和前面三篇相同的主题，而且是结合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批判的语境主义变体来展开讨论。最后两篇论文从这种论证结构中清理出了两条线索，并且加以发挥：一条是个体的不可言说问题，另一条是，尽管本质上具有修辞特征，哲学文本为何没有融入文学范畴？

哈贝马斯

1988年2月于法兰克福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回归形而上学？	1
第一章 移动的现代视界	3
1 四种哲学思潮	3
2 现代思想的主题	6
3 认识与偏见	8
第二章 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10
第三章 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	27
1 形而上学面面观	29
2 程序合理性	33
3 理性的定位	38
4 语言学转向	42
5 超验的萎缩	47
第二编 实用主义转型	51
第四章 论行为、言语行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以及 生活世界	53
1.1 言语与行为	54
1.2 交往行为与策略行为	58
2.1 意义理论中的语用学转型	64
2.2 从社会行为到社会秩序	70

3.1 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概念	75
3.2 社会作为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	82
第五章 意义理论批判	90
1 意义理论的三种命题	90
2 语义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	98
3 言语行为，交往行为，策略性互动	108
第六章 论塞尔的《意义，交往及表现》	120
第三编 形而上学与理性批判	135
第七章 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	137
第八章 个体化与社会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	170
第九章 论哲学、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221
附录	
第十章 书评：回归形而上学？	245
作者后记	257
人名索引	259
译者后记	264

第一编 回归形而上学？

第一章 移动的现代视界

二十世纪哲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堪称现代哲学？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其实不然。早在本世纪之初，哲学思想不就出现了同绘画转向抽象、音乐由八音度转变为十二音度以及文学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一样的发展断层吗？如果像哲学这样一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古典文化及其复兴的事业果真能够面向由于革新、试验和加速发展而永远处于变动状态的现代精神，那么，人们或许就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哲学是否也会像当代建筑一样面临着现代的老化问题？（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当代建筑以一种温和的挑战姿态重新使用那些已经成为历史或被抛弃的装饰物，那么，哲学与这种后现代建筑之间有无相似之处呢？

至少在术语上有类似的地方。当代哲学家也在庆贺他们告别了现代（步入后现代）。他们中有些人自称后分析哲学家，另一些人则自封为后结构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由于尚未达到他们的“后主义”（Postism），因而险些不被信任。

1 四种哲学思潮

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已有若干世纪的历史。今天，各种思潮日新月异。哲学思潮

说到底是一种效果史现象。它们遮蔽了学院哲学的永恒发展过程。学院哲学的变化周期比较漫长，因而与问题和学派的不断更迭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由于学院哲学提出了其问题，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它在本世纪也形成了四种思潮，分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这四种思潮之间差别很大，我们只要深入考察一下，立刻就会发现这一点。不过，它们到底还是一条思想大河中的四种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黑格尔称哲学思想为“精神形态”（*Gestalten des Geistes*），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因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一旦被认可了其独特性和命名，就已经偏离了其原旨，也就注定要走向消亡。就此而言，“后主义”并非一味地见风使舵；作为时代精神的测量仪，我们倒是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后主义”。

上述四种思潮在形式、结构和影响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尤其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在学科内部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迹。它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史家和标准像。个别著作已经称得上是经典文献：分析哲学方面有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现象学方面则有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之间，都有着一定的不同，这表明（他们各自的哲学都发生了）某种转向。此外，这两种思潮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语言分析分为科学论和日常语言论。现象学则在人类学方向上拓展，并沿着本体论方向深化，接着双管齐下，吸收了存在主义的现实性。继法国最后一批具有创造性的代表人物如萨特、梅洛-庞蒂之后，现象学似乎已经四分五裂，相反，分析哲学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独步一时，时至今日，由于有了奎因和戴维森，分析哲学依然占据着垄断地位。

各种力量的空前集中，看来已经完全从内部决定了这种为规范的自我批判所左右，并根据自身的问题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分析哲学）传统的走向。分析哲学传统最终在库恩那里形成一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则形成一种后分析语言哲学的语境主义。而且，正是在这种自我扬弃中，分析哲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而促使语言分析继续决定着这一领域的阐释水准。

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类型。结构主义是由外界（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亚杰的心理学）促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布洛赫和葛兰西）则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恢复成反思哲学。但是，早在社会理论温床上的思辨思想萌芽之前，上述这两种思潮就在各种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为自己铺平了道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联姻，并因此而激发流亡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出版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过巴什拉的科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当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恢复成一种纯粹哲学时，结构主义才通过本想对它加以克服的福科和德里达等人刚刚进入哲学思想的领域。由此可见，这些哲学思潮告别现代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尚未丧失活力的领域里，其理论生产的社会科学特征和专业哲学特征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尼采推向极端的理性批判。分析哲学不断自我扬弃，现象学则在自行消解，结果就是科学化和世界观化。

2 现代思想的主题

上述四种思潮是本世纪所特有的。这样讲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概述不只是对它们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呢？它们是现代所特有的思想吗？如果是，那么，远离它们是否就意味着告别现代呢？

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这点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网罗一切思潮的特殊的现代因素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思想主题。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概括地说，这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

经验科学已经获得了一种自足自律的地位，这点实际上已不足为奇——从实证主义角度对经验科学的自主性加以弘扬也不再新鲜。但即使是尼采，在他对柏拉图主义的拒斥中，也仍然离不开强大的传统理论概念，及其对总体性的把握，和对通往真理的特殊途径的诉求。只有在一种平和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前提下，这种强大的理论概念才会瓦解——这种理论概念不仅要把握人类世界，而且要从内部结构上掌握自然界。科学活动的程序合理性依然决定着命题的真伪。由于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情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想确定一种能够彻底划清科学和形而上学界限的意义范畴也就注定徒劳无益。不仅如此，早期胡塞尔和青年霍克海默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使哲学思想承认科学的示范地位。今天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

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导致了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性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语言学家的重建工作代替了难以检验的反思。由于连接符号、构成命题和作出表达等所遵守的规则可以从作为先验之物的语言结构中推导出来，所以，不仅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基础，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形式语义学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甚至批判理论最终也未能摆脱语言学转向。

此外，本体论意义上的现象学以终极性、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名义剥夺了理性的古典属性。先验意识应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自己呈现出来，并在历史形态中使自己丰富起来。人类学意义上的现象学则把肉体、行为和语言作为其他的表现媒介而补充了进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法、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中的传统语境、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以及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总体性等，都试图把偶像化的抽象理性重新放回到其语境当中，并把理性定位在它所特有的活动范围内。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极端最终颠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古典关系。但无论是从皮尔斯到米德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皮亚杰的成长心理学或维果斯基的语言理论，还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都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实践以及我们与人和物的交往中。这样也就澄清了实践哲学在现象学和（从早期马尔库塞和后期萨特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建立的盘根错节关系。

3 认识与偏见

撇开学派间的壁垒不论，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等思想主题，都属于二十世纪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动力。当然，它们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认识，同样也有新的偏见。

比如说，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Szientismus），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使语言阐释世界的功能相对独立于内在的学习过程，并把语言图景的变换神化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原始事件（Ursprungsgeschehen）。

怀疑论的理性概念使哲学彻底醒悟过来，并且同时明确了哲学作为理性保护神的角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种彻底的理性批判也流行开来，不仅反对知性膨胀成为工具理性，而且把理性与压制（Repression）彻底等同起来，目的是为了从某个他者那里寻求一种宿命论或怀疑论的出路。

澄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哲学思想没有沾染上独立的幻想，并且使哲学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诸多超出断言范围的有效性要求。然而，这也使得许多人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实践被还原成劳动，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以及话语之

间的多重关系被遮蔽了。

当前，在一种已经越来越模糊的情境中，许多新的聚合却日益明确。但是，围绕那些永恒主题所展开的争论一如既往，诸如有关多元声音中理性同一性的争论，有关科学复调中哲学思想的地位的争论，有关内行与外行（Esoterik und Exoterik）的争论，有关专门科学与启蒙的争论，最终还有关于哲学与文学之间界限的争论等等。此外，十多年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复辟浪潮，也使一个自始至终伴随着现代性的主题浮上岸来，这就是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

第二章 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迪特·亨利希大仁大义，把我的一篇评论文章 作为契机，展开一场带有元批判性质的讨论，旨在袒露其哲学研究的宏旨。他就“何谓形而上学——何谓现代性？” 所提出的这十二条论纲，简明扼要地提供了一种对抗规则，对此，我在这里不可能如法炮制，一一做出答复。我的论述不如说具有一种对哲学研究这一公众事业及其主题作前理解的特征。这篇文章不光是要把争论的细节阐述清楚，也要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弄懂这位杰出同仁的思想动机——本着友好的态度，怀着敬重和仰慕，去审视其思路，并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更好地把握自身的思想动机。

近年来，迪特·亨利希比以前更加坚定不移地做康德之后一直还在坚持的形而上学的卫道士。这种形而上学始于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论，后来又吸纳了由黑格尔的现象学、荷尔德林的颂歌以及贝多芬的交响曲所构成的三重奏。亨利希高举后

哈贝马斯：《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哲学中的一种趋势》（Rückkehr zur Metaphysik—Eine Tendenz i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载：《水星》（Merkur），1985，第439/440期，第898页及下两页。亦可参阅本书附录。

亨利希：《何谓形而上学——何谓现代性？反对哈贝马斯的论纲》（Was ist Metaphysik—Was Moderne?Thesen gegen Jürgen Habermas），载：《概念》（Konzepte），Frankfurt am Main,1978，第11—43页。

康德形而上学的大旗，对抗当代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背景哲学——事实上就是要在分析唯物主义面前证明其有效性。亨利希的这一抉择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它要求把认知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系与自我理解作为出发点。主体应当回到作为自我解释的标准视界，并且具有建构世界功能的主体性那里，而不必根据偶然的事和物所构成的世界来理解自身。

因此，形而上学、对自然主义的拒绝以及回归主体性也就构成了亨利希哲学研究的主题。亨利希研究哲学从来不隐讳其关怀对象：

自我通过对自身正确性标准的考察，来为它的存在操心。最终，自我或许能够替其自身的可能性找到内在原因，使自我不会像面对自然那样感到陌生和无关痛痒，因为在自然面前它必须尽量捍卫自身。

亨利希这段话忽视了“自身可能性的内在原因”应当满足的条件。亨利希难道是一开始就对这些条件作了限制，以至于最终只有和物质相对并从内在渗透到自然当中的精神，亦即无论如何都能在柏拉图传统中加以理解的精神，作为合适的选择对象尚在考虑之列？不管怎样，亨利希都认为，现代意识的地位不是由纯粹的自我捍卫的偶在性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怎样捍卫一种有意识的、创新自适的生活。但是，如果这种有意识的生活只有借助形而上学手段才能醒悟过来，那么形而上学和现代性之

亨利希：《现代哲学的基本结构》（Die Grundstruktur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附录：《论自我意识和自我捍卫》（über Selbstbewußtsein und Selbsterhaltung），载艾柏林编：《主体性与自我捍卫》（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erhaltung），Frankfurt am Main, 1976，第114页。